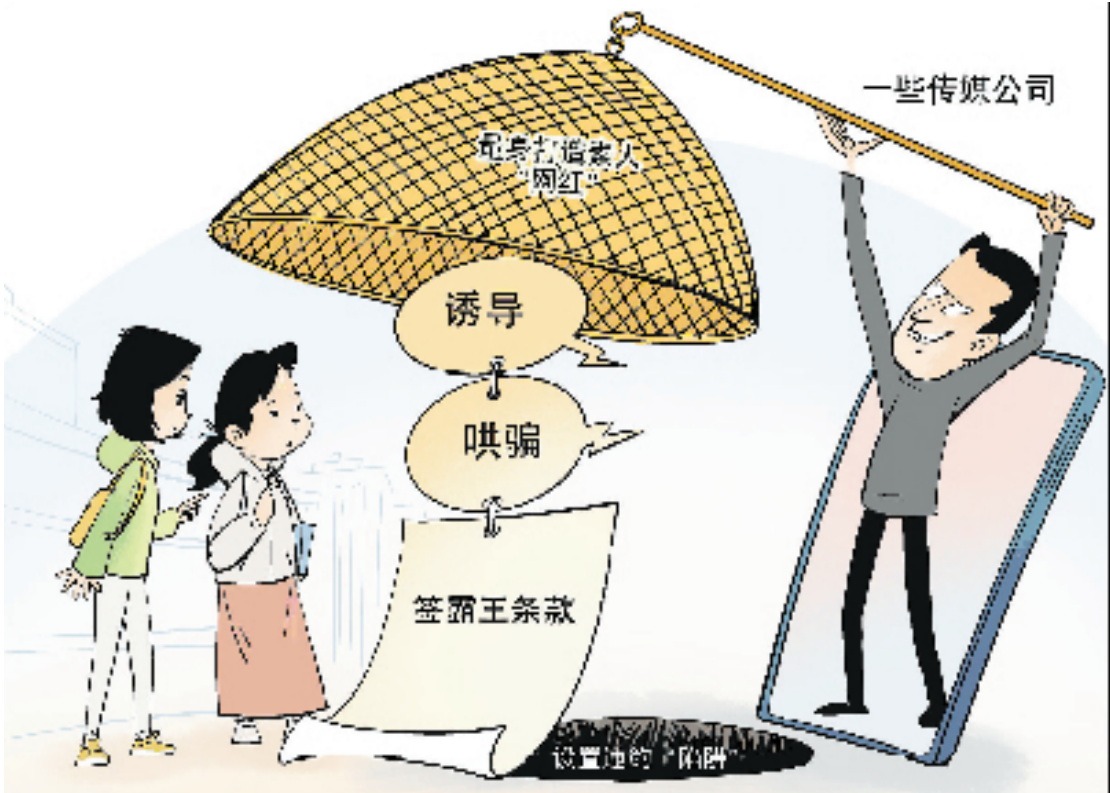


想当“网红”为何反陷官司?

新华社 吴文诩 余佩璇

近期,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受理 16 起涉及演出经纪纠纷案件,被告均为年轻女性,其中 15 人为在校大学生,原告则是同一家传媒公司。签约全球范围内演艺事务合约、不收取任何培训费用、专业团队量身打造素人“网红”……记者调查发现,看似光鲜亮丽的“造梦”计划,带来的却是“违约”被起诉、被要求赔偿数十万元的“噩梦”。



十余名在校大学生遭遇违约官司

2023 年 10 月,大学生小关(化名)在某社交平台上收到一条私信。对方自称北京某传媒公司,表示小关形象气质好,符合公司培养条件,可以免费提供“素人精品 IP 孵化”服务,并希望与其签约。

抱着获得一份兼职的想法,小关同意了对方的邀约。次日,该公司一名员工添加小关的微信,进一步介绍业务:“主要做穿搭和美妆,不需要交钱,无直播要求,公司仅剩最后一个名额,正规业务,无任何风险。”

在对方发来的正式合同中,小关看到明确提及直播等拍摄内容,要求较为严苛,违反需要支付高额违约金。对此,该工作人员表示:“合同仅为模版,不会追要违约金,也无需按照合同履行拍摄义务。”

确认完拍摄方式和时间等具体问题,小关与该公司线上签约。然而,一个多月后,该公司“专属运营人员”却要求其进行直播。小关表示“之前沟通没有直播”,但对方态度强硬,称合同上明确列出需要直播,口头承诺不算数,并在此后一直催促小关直播。

小关参加过几次简单的拍摄,自行垫付了部分费用,但报销申请却被公司以拍摄质量达不到要求等为由拒绝。双方就直播、报销等问题多次沟通无果,该公司称小关“不履行合约”,将其告上法庭,要求赔偿经济损失近 30 万元。

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法官魏若男说,这家公司同样案由的诉讼共 16 件,被告主要是在校大学生,要求赔偿金额都在 30 万元上下,目前都以撤诉结案。

“广撒网”签约后承诺不兑现

记者调查发现,这家传媒公司先是在网络平台有针对性地“广撒网”,再利用在校大学生不熟悉“网红”行业规则和相关法律条款,诱惑其签约,通过设计不公平的合同内容或进行虚假承诺,导致其陷入法律纠纷。

多名学生表示,“噩梦”的开始源于一条免费打造素人“网红”的私信。据了解,该公司会通过搜索等筛选出有自我展示需求的大学生,发私信联系,反复强调免费、多个成功案例等来打消对方的疑虑。

“前期沟通时基本达成一致,对方还给了一些承诺,不知不觉就放松警惕相信了。”大学生小林(化名)说。而一旦签约,之前谈好的条件则成了“空头支票”,“明明说好不直播,不用按合同走,现在却拿直播卡我们违约。”

小林等人向记者展示了与该公司签订合同前的聊天记录,对方工作人员明确承诺没有直播要求、合同是模版、里面条款不作数等。

记者注意到,该公司提供的《平台公司合作协议》,工作时长、工作强度等条款明显不适用兼职在校大学生。例如,合同规定“每月直播不少于 24 日,每日直播时长不少于 3 小时”,并要求除直播外,按时、保质完成安排的其他工作。“大学生要正常上课,这样的工作量怎么可能完成?”一位受访业内人士质疑道。

据了解,该公司曾承诺会安排专业运营人员对接,提供相关拍摄设备及拍摄技巧、账号运营、视频剪辑等各类培训。但实际上,培训仅为几个电子文档供线上自学。

此外,该公司在提交的民事起诉状上,列举了作品创作及制作、运营、艺人生活管理、推广宣传等费用近 9 万元,均无法有效证实。

比如共计 3 小时的拍摄费用,涉及摄影师人工费、交通费等 4 万余元,而相关摄影师提供的手写证据材料显示,其为该公司在社交平台上找的临时工,并非所谓的“大牌摄影师”,每小时收费仅为几十元,也并未产生交通费、差旅费等。

记者在企查查上发现,该传媒公司在 2024 年 1 月因登记住所无法联系,被北京市大兴区市场监管部门列入企业经营异常名录。

加强行业规范 提高防范意识

《中国网络视听发展研究报告(2024)》显示,截至 2023 年 12 月,职业主播数量已达 1508 万人,主要短视频平台日均短视频更新量近 8000 万,日直播场次超 350 万场。

受访业内人士和法律界人士表示,网红经济作为新兴业态,为许多年轻人提供了展现自我、实现梦想的机会。但当前行业内公司良莠不齐,相关部门应加强监管力度,制定更加严格的法规和行业规范。

法院审理时认为,从双方提供的证据来看,传媒公司存在诱导签订霸王合同、故意设置违约“陷阱”的可能。为了有效维护在校大学生的合法权益,法官与原告律师阐明相关事宜,最终该公司选择撤诉。

有律师认为,个别不法公司通过“广撒网”定位相关群体,用诱导、哄骗等手段促使对方签下霸王条款,再以支付签约费、虚增收入等方式作为违约成本获取不当利益,应坚决予以打击。

魏若男说,年轻群体要提高防范意识和法律意识,签署协议时应仔细查看协议条款,特别注意赏罚、违约条款,切勿轻信口头承诺。

《半月谈》王俊杰 鲁畅
周思宇 杜一方 魏婧宇

2024 年以来,有关部门持续规范社会事务进校园行为,各地出台“进校园事项白名单”等多项举措。基层教师普遍反映,减负成效明显。

然而,记者调查发现,在一些地方,以落实社会责任为名,一些不必要的非教学事务通过“临时性任务”“分支考核”等方式进入校园,给教师在繁重的教学工作外又找了一份“免费兼职”。如何让此类非教学事务远离课堂,还老师和学生一个清静的校园?

额外责任学校担,隐性考核难把关

记者了解到,2024 年以来,多地教育部门通过“进校园事项白名单”、教育信息统计规范化等方式,有效整治与教育教学无关的事务随意进入校园,为基层中小学教师减负。

重庆市璧山区御湖小学校长薛霁感慨道,得益于专项整治工作,自己在拒绝各部门不合理需求时“有了底气”,璧山区教师对减负成效满意度达 97%。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克什克腾旗新庙中学教导主任陈天旭说,以前社会活动进校园,需要教师做社会服务,占用教师时间,现在出台白名单后,学校和教师的负担都大大减轻。

校园减负效果明显,但仍有多名教育工作者向记者反映,一些部门单位仍以“社会责任”为名,通过“分支考核”等隐性考核手段将非教学事务渗透进校园。

在一些靠近主干道的学校,其所属区域内电动车驾乘人员佩戴安全头盔率低,最后管理、宣教却变成学校的责任。一名学校管理者说:“有些不戴头盔的人并非接送学生的家长,但相关部门要求学校承担更多责任。”

这种情况并非个案。记者了解到,一些以社会责任为名的临时性增量任务往往不受“白名单”制约。

在一些学校,安全管理成为教师最主要的工作压力,不仅有大量检查,教师在周末、假期等时段也要追踪学生是否安全。一名校长坦言:“学校有安全教育责任,但非教学时间中的安全监管责任也由教师承担并不现实。”

记者在多地采访了解到,基层教育部门在配合完成地方中心工作与严把社会事务“入口关”间感到“两难”。多地受访教育部门负责人称,当前在制定各类工作考核细则时,教育部门往往没有发言权,导致“分支考核”“不可控”地渗入校园。“部分工作没有征求过我们的意见,一纸文件就直接发下来。”一位教育部门负责人说。

及时清理不合理的“隐性考核”

事实上,有的非教学事务性工作对于学校的教育工作不可或缺,须由学校老师承担。业内人士表示,对于这部分工作,要利用数字化、智能化应用等技术赋能的方式逐步“消化”,尽量减少其带给教师的负担。

不合理的“隐性考核”,则要及时清理。基层教育部门工作人员认为,应持续跟踪社会事务进校园情况,强化并清理部分与教学无关的“隐性考核”,对确需学校配合的事务,按照“谁主张谁负责、谁审批谁负责”原则,由主责部门牵头并落实。此外,可考虑对社会事务进校园等违规行为开展“回头看”等定期督查,探索建立教师负担“黑白名单”公示机制。

从根本上为教育工作者“松绑减负”,还是要持续优化学校和教师的考核体系,营造良好的教育教学环境。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等呼吁,遵循教育规律,对学校制定更科学的考评体系,减少不必要的非教学任务行政发文和指令。

基层教职工期盼,持续减少各类督导、检查、评比等进校园,探索更为合理的督导形式及标准,而不只是看材料记录上是否留痕。还有一些教师期盼,持续优化学校考核机制,在制订考核目标时,更多听取基层学校及教育部门意见。

『临时性任务』不受减负『白名单』约束? 隐性考核困扰教师